

毛泽东思想的重要遗产：“走自己的路”思想研究

马启民

(陕西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陕西 西安 710061)

摘要:毛泽东思想是党的指导思想,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来源和思想前提,把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具体实践相结合,走自己的路,是毛泽东思想遗产中最具亮点的思想之一。这一思想具有深刻的学术和学理基础,已成为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的政治传统、思想传统和行为方式。在历史的长河中,这一思想被坚持、继承和发展。研究这一思想的内在结构和逻辑,对于在新时代历史条件下坚持马克思主义,走好自己的路,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关键词:毛泽东思想;思想遗产;走自己的路;理论核心

中图分类号:A8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7192(2021)03-0001-06

毛泽东在领导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中,给中国人民和中国共产党留下了丰厚的思想遗产,其中,“把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走自己的路”是毛泽东思想遗产的核心,它在毛泽东的整个思想中占据中心地位。它是一种理论原理,在百年的中共实践中屡被证实;它是一个理论体系,内在结构严密而系统;它犹如一种普照的光,照耀着他的思想的各个方面。探讨这一思想遗产不衰的价值,具有常觅常新的启示。这一思想遗产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一、毛泽东创造性地提出了“走自己的路”的系统理论

1. “走自己的路”的思想方法

“走自己的路”不是一种常识,也不是一种箴言。在毛泽东的话语中,它是一种由各种要素构成的理论。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内第一次提出要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走自己的路的思想。毛泽东不是简单地从经验出发,而是从哲学的高度出发,从理论和思想的角度奠定认识这一问题的根基。在毛泽东20世纪30年代的著作《矛盾论》中,从矛盾的普遍性和

矛盾的特殊性的相互关系揭示了“走自己的路”是矛盾普遍性和特殊性相统一的体现。毛泽东认为,把握矛盾的普遍性与特殊性、共性与个性、绝对与相对的辩证关系非常关键,提出了“共性与个性、相对与绝对的道理,是关于事物矛盾问题的精髓”的著名论断^{[1]320}。普遍性与特殊性、共性与个性相互关系的原理是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与本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原则的哲学基础。如果片面强调普遍性,忽视特殊性,就会犯教条主义错误;如果片面强调特殊性,忽视普遍性,就会犯经验主义错误。把普遍性和特殊性结合起来,就不是照搬和空谈,也不是狭隘的经验,而是一种包含普遍性的特殊的具体形态,就是一种不同于他物的具有自己规定性即特色的我物,也就是“走自己的路”的形态。因此,毛泽东提出把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就是把共性和个性相统一,把普遍性与特殊性相结合,它的必然的逻辑结果和客观的现实结果就是一种“走自己的路”的必然结论。毛泽东通过马克思主义哲学辩证法的理论思维,通过矛盾普遍性和特殊性相统一的原理,奠定了“走自己的路”的理论和方法论基础。

20世纪30年代,毛泽东在《矛盾论》写作前一个月撰写了另一篇重要著作《实践论》。就这两本

著作写作的时间来看,毛泽东是同时从两个角度去思考同一问题的。《实践论》是从主体论的角度,《矛盾论》是从本体论的角度来认识这些问题的。《实践论》和《矛盾论》具有内在的统一性,它们从主体论和本体论的角度整体论述了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道理。在《实践论》中,毛泽东从主体的角度,也即从理论与实践的关系揭示了为什么必须把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他指出:“在马克思主义看来,理论是重要的,它的重要性充分地表现在列宁说过的一句话:‘没有革命的理论,就不会有革命的运动。’^{[2]443}然而马克思主义看重理论,正是,也仅仅是,因为它能够指导行动。如果有了正确的理论,只是把它空谈一阵,束之高阁,并不实行,那么,这种理论再好也是没有意义的。认识从实践始,经过实践得到了理论认识,还须再回到实践中去。”^{[1]292}这就是检验理论和发展理论的过程。从认识论来看,共性和个性的关系贯穿在理论与实践关系之中,反映普遍的共性的科学理论要在实践当中检验、发展和存在,事物的特殊性的认识也只有在普遍性认识的指导下通过具体实践的过程而达到。实践总是具体的,因此共性的理论总是在具体事物的实践中,以实践的具体性和条件的差异性表现为多样化的形式,因此理论总只是有方法论的意义,通过实践认识的具体事物表现的形式则是多种多样的。这就奠定了认识论中“把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走自己的路”的哲学认识论基础。

2. “走自己的路”的基本原理

从社会发展规律的角度看,任何一个发展成功或良性运行的社会,都是在共性与个性相统一的条件下,体现这个社会普遍的共性和具体社会的个性的基础上发展的,其形态都是具有自我个性的特征的。就社会主义国家而言,把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和本国实际相结合,走适合自己的发展道路是兴衰成败的关键,“把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与本国实际相结合,走自己的路”,实际上已经成为一条马克思主义思想宝库中的科学的原理,这一原理是中国共产党人总结自己的实践经验上升为科学理论的重要表现,它是毛泽东创立的。邓小平把这一思想看作普遍的原理。他在回答发展中国家领导人寻求

中国经验的问题时,总是直率地说不要照搬中国,但是他总是明确和肯定地说,要从自己国家的实际出发,走自己的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含义就包含这一思想,一方面把马克思主义运用于中国实际;另一方面从中国实际的实践中,把经验上升为理论。这些理论,有一些是中国的,也有一些是世界的、普遍的,是具有科学的原理在内的。把普遍性与特殊性相统一,通过科学理论与具体实践相结合的方法,走自己的路,是一个社会发展带有规律性的东西。在社会主义国家,把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与本国实际相结合,走自己的路,是一条带有普遍性的原理,这是中国共产党人给马克思主义理论宝库中增添的科学理论。

3. “走自己的路”的实现条件

毛泽东不但科学论证了走自己路的哲学基础,同时也正确地论证了走自己路的实现条件。在毛泽东那里这一条件包含两大原则:就是坚持独立自主的原则,不受外部压力和干扰,独立自主地探索自己的路;坚持群众路线的原则,依靠群众的首创精神和智慧,在千百万群众的实践中探索自己的路。在走自己路的过程中,实际上会受到不同历史阶段的不同形式的压力和干扰,能不能坚持“把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和本国具体实践相结合,走自己的路”,邓小平对这一条的实现条件说得最清楚。他在走自己的路的最经典的表述之后说道:“中国的事情要按照中国的情况来办,要依靠中国人自己的力量来办。独立自主,自力更生,无论过去、现在和将来,都是我们的立足点。”^{[3]3}可以看出,邓小平最精通毛泽东“走自己的路”的思想。这也是邓小平指导中国改革开放“走自己的路”成功的原因。

从以上论述可以看出,毛泽东关于“走自己的路”的思想是具有自己特定概念和内容的系统理论。邓小平把它概括为“把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道路”^{[3]3},这一表述有深刻的道理:“把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同中国实际相结合”,是“走自己的路”的理论前提、思想方法和有机组成部分,找到一条适合自己发展的道路也即自己的路是“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根本目的、必然结论和自然的结果,二者是一种不可分割的密切联系的统一体。

二、毛泽东为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树立了“走自己的路”的政治传统、思想传统、文化传统

所谓传统,就是从历史沿传下来的思想、文化、制度以及行为方式。

政治传统,在这里指的是中国共产党的行为方式,把“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走自己的路”是毛泽东在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确立和厉行的一种行为方式,由于这一行为方式的科学性、有效性,它已经由毛泽东的行为方式转化为中国共产党的行为方式,由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延续到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开放新时期,成为中国共产党的政治传统。所谓思想传统,就是把毛泽东关于“把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走自己的路”的思想和理论看作科学的思想指引,成为历届党认识形势和制定路线方针的思想方法,成为历届党的理论体系的核心内容。

文化传统,是指中国共产党的这一思想已经成为中华文化的一部分,和中华文化融为一体,成为中国人民分析和认识问题的文化因子,正如刘少奇在党的七大修改党章的报告中指出的:毛泽东的“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具体实际相结合”这一思想,“把我国民族的思想水平提到了从来未有的合理高度”^{[4]319}。把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实际相结合,走自己的路。学习别人的长处,但不依仗别人,独立自主地创造自己的社会愿景和生活方式,这是在秉承中华文化五千年文明发展和自强不息精神的基础上当代的新发展,这一思想也成为了民族文化的一部分,成为中国人的思维方式、精神品格和文化传统。对于这一传统,中国问题研究的外国学者常常用这一传统预测中国共产党的发展走向。著名的美国中国问题学者费正清和鲍大可对中国的预言就是一个很好的说明。第一个预言:50年代初费正清关于中苏同盟走向的预言。50年代初,美国国内政治家看到中苏结盟,认为这一下中国和苏联走到一起来了。但是深深了解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美国中国问题专家费正清却认为,根据毛泽东的特点和其思想,他是要走自己的独立的路的领袖,而苏联斯大林的作风,中

苏联不会长久。果不然,1957年以后发生分裂,1959年后中苏联盟就解体了。为什么费正清能意识到这个问题,他是看到了毛泽东思想的特征和实质。第二个预言:1990年美国中国问题专家鲍大可的一个预言。当时苏联东欧共产党国家正在解体,随着苏联的解体,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像诺骨米骨牌一样,一个一个纷纷倒下。西方学术界在争论一个重大问题,中国是否将重蹈苏联覆辙?鲍大可运用自己的中国知识,在其论著《新世界——新方向》一书中运用自己多年研究所积累的知识与经验,回答了普遍存在于西方人心理上这一重大问题。他认为,中国不可能走苏联的路。因为中国取得革命胜利的方式不同,它是在中国领袖毛泽东自己创造的农村包围城市的方式下取得政权的,中国社会的架构不会随同东欧那场“雪崩”而陷于塌陷。鲍大可认为,中国更有可能的是,尽管其途曲折,但它会继续沿崎岖山路摸索着改革前行。在前行的过程中,中国会不断经历意义深远的变革,但这却是以它自己的速度进行的,并且,它会始终走自己独特的道路^{[5]147}。可以看到,有眼光的一些外国学者在预测中国发展的重大节点上,其分析的方法更侧重于分析中共领袖毛泽东所建造和竖立的独特的经验传统和历史传统以及其所做事的行为方式,他们看到独立自主地走自己的路已经成为中国共产党的思想传统和经验传统。中国革命走自己的路,在中国社会主义道路上,也会走自己的路,它不会受别人的影响。实际情况就是这样,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毛泽东提出了第一次结合,亦即把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走中国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在新中国成立后,随着社会主义改造的完成,中国怎么走?建国初期,由于没有经验,提出向苏联学习的口号,这是必要的。但也出现了一种照搬苏联社会主义建设模式的倾向,正是在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开端的节点上,毛泽东清醒地提出第二次结合问题,不走苏联的路,走自己的路。1956年4月,毛泽东指出:“我们有了初步的实践,又有苏联的经验和教训,应当更加强调从中国国情出发,在结合上下工夫,‘进行第二次结合,找出在中国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正确道路。’”^{[6]23}1960年,毛泽东对新中国成立后十年间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做了一个

提纲式的总结,他说:“前八年照抄外国经验。但从1956年提出十大关系起,开始找到自己的一条适合中国的路线”^{[7]1082}。在1962年初春的讲话中,毛泽东要求“必须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具体实际、并且同今后世界革命的具体实际,尽可能好一些地结合起来,从实践中一步一步地认识斗争的客观规律”^{[8]828-829}。正如党史学者石仲泉指出的,“这表明,党要进行第二次伟大革命、探索中国自己的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的任务,已经提出”^[9]。经过革命时期和建设时期这两次走自己路的实践,在中国共产党内和中国人民中间实际已经形成了一种传统。中国的路要靠中国人民走,不要照搬别人。把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走自己的路,这个传统是毛泽东竖立起来的。当然,认识到要把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和中国实际相结合,但能不能结合得好,能不能走好自己的路,还是两回事。这个意识和这个传统很重要。改革开放以后,邓小平多次重述了由毛泽东竖立起的这个传统,因此,苏东事变对中国没有多大的影响,中国还是走自己的路,而且在自己的路上成功的经验越来越丰富,自信心越来越强。著名党史学者胡绳认为,为什么苏联倒了中国没有倒,这是毛泽东走自己的路的结果。

三、毛泽东在“走自己的路”上的成功和失误给后来者提供了丰富的经验教训

毛泽东一生走自己的路,有三条。一条是中国由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道路,一条是中国式的社会主义改造的道路,一条是探索社会主义建设的道路。前两条成功了,有成功的经验。后一条有一部分成功,有一部分失败。虽然失败,但毛泽东探索社会主义建设的道路不是一种照搬,而是在走自己路的探索中犯的错误。

胡绳在学术界对毛泽东晚年犯的错误特点使用了“探索”这一概念。他在《毛泽东一生所做的两件事》一文中指出:“事实上,他是犯了大跃进、人民公社等错误,直至‘文化大革命’那样严重错误。但他犯的不是照抄苏联模式的错误。他是想摆脱苏联模式的影响,为找到适合中国情况的新的道路

进行探索,在探索中走入歧路。”^[10]这一提法逐渐为学术界接受,著名党史专家龚育之后来也说:毛泽东的错误是“在探索中国自己的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中走入歧途的错误。”^[11]用“探索”一词揭示毛泽东晚年错误的特征,一方面,他是想探索一条适合中国情况的新路;另一方面,在走自己路的过程中走入歧路。显然,所谓的“文化大革命”就是这样的歧路,它给中国发展和中国人民带来了痛苦和灾难。

毛泽东晚年在“走自己的路”过程中犯了两大错误:一个是“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的错误,一个是发动“文化大革命”的错误。关于把“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看作是毛泽东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看法是有充分依据的。在由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集体撰写、胡绳主编的《中国共产党七十年》一书中,有这么两句话:一句是“‘大跃进’的提出,标志着党力图在探索中国自己的建设道路中打开一个崭新的局面,历史证明,这个努力是不成功的。”^{[12]349}另一句是“‘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是党在探索中国自己的建设社会主义道路过程中的一次严重失误”^{[2]354}。与此同时,把中国的“大跃进”看作寻找自己的路的观点在一些著名的国外中国问题研究专家的著述中也有同样的论述。由美国学者R. 麦克法夸尔和费正清主编的《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一书认为:“大跃进”时期标志着中国抛弃苏联建设模式,而开始了“中国道路”,其篇章安排结构上,以“寻求中国道路”为题,记述了中国从1958-1965年的历史,在他们看来,“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代替了从苏联引进的发展策略,因而是中国寻求自己道路的表现。国外学者的这个看法,有其合理性,但也有偏颇之处。实际上,从1956年开始,以毛泽东的《论十大关系》及党的八大为标志,中国共产党就开始探索中国道路,而且取得了较为明显的成就。正如毛泽东在《十年总结》中所说:“从一九五六年提出十大关系起,开始找到自己的一条适合中国的路线”^{[7]1082}。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著的《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二卷(1949-1978)中对何时开始体现中国道路的探索有很好的说明,它以“党的八大和探索中国自己的建设社会主义道路的良好开端”为章节标题,对1956年到大跃进之前的党的主要活动进行了科学概括,这一提法是有充分的事实根据的。只是到了1958年后,在

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中发生了曲折和失误。关于毛泽东晚年发动并推崇的“文化大革命”,就毛泽东主观动机来说,是一种在社会主义条件下防止和平演变的尝试和探索,但由于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时期阶级斗争理论的误解,对中国社会阶级状况、党内状况和社会主义主要矛盾的错误判断,正如第二个党的历史决议所说的那样:“明显地脱离了作为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和中国革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毛泽东思想的轨道”^{[3]28}。因此,“‘文化大革命’是在探索中国自己的社会主义道路的努力走入歧途的结果,是在错误理论指导下的错误实践”^{[12]463}。

为什么一贯倡导把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走自己的路的毛泽东还会犯这样的错误呢?胡绳曾经指出,把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和中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是一个复杂的问题,一方面有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问题,另一方面也有对中国实际的把握问题。事实的确是这样,从主体方面讲,结合者这一主体本身也是一个变数,因为每一主体都是由其经验、见识、阅历、价值取向、思维方式、民主精神、科学素质等要素构成的。主体的这些要素,在一定条件下也是一个变量,这些对于正确理解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和把握真实的客观实际,走符合中国实际的自己的路都有直接的联系。从客体来讲,随着时代的变化,怎样看待马克思主义和变化中的中国实际也是一个重大的问题。邓小平指出:“马克思去世后一百多年,究竟发生了什么变化,在变化的条件下,如何认识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没有搞清楚。”^{[3]291}在这里他提出了一个马克思主义时代化的重大理论问题。深刻认识马克思主义时代化,就是在时代主题、特征发生变化的条件下,立足实践,明确哪些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哪些是适宜于当时主题而在主题发生变化后变成了个别结论;哪些是随着实践的扩大和深入而发现和重新整理出来的在马克思主义中早已有之但未引起重视的重要理论,哪些是马克思主义中潜在的适应未来的论点随着时代主题与实践的变化而上升为基本的原理。比如暴力革命作为革命和战争条件下的基本原理在和平和发展条件下就变成个别结论。马克思全球化的思想在今天被挖掘和整理出来成为当代一种分析国际关系和世界发展的重要理论。马克思关于人的全面发展的思

想和论点在今天社会条件下已上升为基本原理。这里应该指出,马克思主义最基本的原理没有变,但马克思列宁所强调的理论重心、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体系结构、马克思主义的话语形态和方式都会随着时代和实践发展而变化。以邓小平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深刻地总结了毛泽东在“走自己路”中的经验教训,一方面,坚持毛泽东走自己的路的基本原理。邓小平指出:“中国革命的成功,是毛泽东同志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走自己的路。现在中国搞建设,也要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的实际相结合,走自己的路。”^{[3]94-95}另一方面,深刻反思了在“走自己的路”问题上的教训,进一步完善和丰富了如何“走自己的路”的重大理论问题,实行了改革开放的伟大决策,把“走自己的路”置于时代和世界的广阔背景之中。邓小平曾经指出:“我们是在一个贫穷的大国里进行改革的,这在世界上是没有先例。我们搞建设有39年,有成功的经验,也有失败的教训。但是光凭自己的经验和教训还解决不了问题,中国要谋求发展,摆脱贫穷和落后,就必须开放。开放不仅是发展国家间的交往,而且要吸收国际的经验。”^{[3]266}把世界的发展经验融汇于中国发展的经验之中,是邓小平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对毛泽东“走自己的路”的丰富和发展。江泽民提出在走自己的路的实践中,不但要认识和掌握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的规律,还要认识世界文明发展的规律。在新时代习近平提出“文明因交流而多彩,文明因互鉴而丰富。文明交流互鉴,是推动人类文明进步和世界和平发展的重要动力”^{[14]258}。这一思想,为中国道路的国际视野提供了重要的理论依据和学理依据。总的来看,把世界的发展经验融汇于中国发展的经验之中,中国道路并不是一个单一因素的命题,而是一个综合性的命题,它既包括中国发展道路的特殊性,又包括社会主义的共性,还包括它与世界文明之间的共性,是三者的统一体。中国特色正是在三者统一中存在的,应该在三者的统一中把握中国特色。有学者指出,“‘中国经验’或‘本土经验’,只有用世界眼光总结才有价值和意义;只有用世界眼光加以提炼,才能运用和推广”^[15]。实际上,用世界眼光总结的“中国经验”才是具有生命力的个性。今天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不但反映了中国的国情、制度、文化和历史的特点,

包含了社会主义的共有因素,也包含了人类社会的共同经验,它是中国的特殊性、社会主义的共性、世界文明的共同性之间的有机结合,而称作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四、结 语

从毛泽东思想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从新中国成立后的30年到改革开放以来的40多年,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中国实际相结合,探索并找到正确的适合自己的路,是一根贯穿70年的红线。从毛泽东《论十大关系》提出走自己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到邓小平在十二大开幕词“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1]3},再到习近平今天讲的“坚持独立自主,就要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既不走封闭僵化的老路,也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2]30}。正是中国共产党人坚持走自己的路,科学地分析正确的路,才使得中国由弱变强、由穷变富,这也正是我们要永远坚持把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和中国实际相结合,走自己的路,永远珍惜毛泽东的这一宝贵思想遗产的原因。

参 考 文 献

- [1] 毛泽东. 毛泽东选集:第1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 [2] 列宁. 列宁全集:第2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
- [3] 邓小平. 邓小平文选:第3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 [4] 刘少奇. 刘少奇文选:上[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
- [5] 马启民. 国外邓小平理论研究评析[M]. 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1998.
- [6] 吴冷西. 十年论战[M]. 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9.
- [7] 毛泽东. 十年总结:手稿(1960年6月18日)[M]//逢先知,金冲及. 毛泽东传:下(1949-1976). 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
- [8] 毛泽东. 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
- [9] 石仲泉.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发展[J]. 中共党史研究,2006(4):3-12.
- [10] 胡绳. 毛泽东一生所做的两件事[N]. 人民日报,1993-12-17(03).
- [11] 龚育之.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异端”问题[J]. 中共党史研究,2007(3):3-5.
- [12] 胡绳. 中国共产党七十年[M]. 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1991.
- [13]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 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注释本)[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
- [14] 习近平.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M]. 北京:外文出版社,2014.
- [15] 郑杭生. 改革开放30年:日趋成熟的中国社会学——有关中国社会学发展全局的几个重大问题[J]. 江苏社会科学,2008(18):1-9.

An Important Legacy of Mao Zedong Thought: A Study on the Thought of “Going One’s Own Way”

MA Qi-min

(School of Marxism, Shaanxi Normal University, Xi'an 710061, China)

Abstract: Mao Zedong Thought, the guiding ideology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is the theoretical source and ideological premise of the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One of the brilliant ideological legacies of Mao Zedong Thought is to combine the universal truth of Marxism with China’s concrete practice by going its own way, which has a profound academic and theoretical foundation. This paper considers that since the thought of “going one’s own way” has been adhered to, inherited and developed in the long river of history, it is taken as the political tradition, the ideological tradition and the behavior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and Chinese people. Therefore, it is of theoretical and practical significance to study the internal structure and logic of this thought for adhering to Marxism and going one’s own way under the historical conditions of the new era.

Key words: Mao Zedong; thought legacy; going one’s own way; theoretical core

【编辑 吴晓利】